

洪武全书

# 洪武御制全书

主编 张德信  
毛佩琦

中国明史学会  
朱元璋研究  
会 编  
中 朱 元 明 史 学 会  
黄 山 研 究 会

# 洪武御制全书

主编 张德信 毛佩琦

中国明史学会  
朱元璋研究会  
黄山书社 编

(皖)新登字 05 号

责任编辑:赵国华

封面设计:牛平汉

版式设计:王 熹

洪武御制全书

张德信 毛佩琦 主编

\*

黄山书社出版发行

(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大中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32 字数:820 千字

1995 年 7 月第 1 版 199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1000

ISBN 7-80535-990-3/7·35

---

定价:68.00 元

137105

## 《洪武全书》工作委员会

主 任 吴庭美 刘重日  
副 主 任 王庆基 姜玉峰 孙建密  
夏玉润  
委 员 (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庆基 刘重日 邓 文  
孙建密 李传华 李济贤  
杨志清 吴庭美 郑以铤  
姜玉峰 夏玉润

## 《洪武全书》特邀顾问

张显清

## 《洪武全书》编辑委员会

主 编 张德信 毛佩琦  
副 主 编 裘玉旺 陈怀仁 王 熹  
编 委 (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 熹 毛佩琦 牛平汉  
吕景琳 张德信 陈怀仁  
李绍宗 胡志华 赵国华  
柏 桦 高寿仙 章 岚  
董三白 裘玉旺

## 《洪武全书》凡例

一、明太祖朱元璋是一位有作为的封建帝王。他的身世和经历,尤其是明朝建立前后的诸多处置,诸如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改革与实践,历来为史学工作者所关注。由于相当多的史料稀见和分散,为研究工作带来极大困难。因此,广泛搜集整理、编辑出版稀见和分散的史料,确是一项艰巨而功德无量的工程。它的制作和完成,对朱元璋和明代历史的研究无疑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本书收录的朱元璋及洪武朝重要文献,名为《洪武全书》。

三、《洪武全书》分二册,一册收录朱元璋御制文献,名《洪武御制全书》;一册收录朱元璋敕撰、敕录、敕定文献,名《洪武敕撰全书》。

四、收录文献,选择善本,标点校勘,简体横排。

五、每册所收文献,以时间先后为序。为保存文献原貌,不加删改。若有避讳之字,可于原文下注出原字,加[ ]以示区别;若有空字,可参考他书补出,加[ ]标示;若无法参补,加□标示。

六、为全面反映朱元璋御制文献和治国言论,《御制文集》未收者,从其他版本中摘出,名《御制文集补》;《宝训》未收者,从《明太祖实录》中摘出,名《宝训补》。

# 序

《洪武全书》是中国明史学会和朱元璋研究会组织编辑的。在凤阳吴庭美、姜玉峰、裘玉旺、陈怀仁等同志的积极参与和有效支持下，终于和读者见面了。当此之际，总要写几句话，作为这部大型资料书的序。写些什么呢？几经斟酌，还是从朱元璋的文化素养谈起，对其出身经历，虚心好学，重视知识，亲近士人，赋诗作文等予以较为全面的论述，目的在于解释朱元璋为什么从放牛娃、小沙弥成为大明王朝的开国皇帝，而且在文化建设上功绩卓著这一长期使人们迷惑不解的疑难问题，及其立法垂宪的制的历史作用。

## 一、青少年时代的磨难与训练

朱元璋（1328—1398）濠州钟离（今安徽凤阳）人。祖籍金陵句容（今南京市句容县）朱家巷。他的祖父朱初一元初为淘金户，因不胜盘剥，带着他的两个儿子朱五一、朱五四离开句容渡江北走，流落在泗州盱眙县垦荒。大约这荒僻之地可以逃过官府赋役，故而家道渐有起色，两个儿子也都因此而娶妻成家。只是好景不长，政府的横征暴敛很快向他们袭来。待初一死后，兄弟二人不得不重走父辈的老路，带上妻小流浪。老大朱五一逃往钟离县东乡，老二朱五四先逃到五河县，仍难以安身，几经辗转，最后也至钟离东乡与哥哥一家同住。后来又从东乡搬到西乡，再从西乡搬到孤庄村。在孤庄村便成了地天

一空的赤贫佃户。老大朱五一生有四个儿子，朱重一、朱重二、朱重三生于盱眙，重五生于钟离。老二朱五四生有四男二女，长男重四与二女生于盱眙，次男重六、重七生于五河。小儿重八，就是朱元璋，于元文宗天历元年九月十八日（1328年10月21日）生于钟离县之东乡。他的母亲姓陈，比丈夫朱五四小五岁。陈姑娘的父亲吃粮当兵，参加过张世杰、陈秀夫壮烈的崖山战斗，并且奇迹般地活了下来，辗转回到故乡扬州，后来到泗州靠巫术占卜度日，这样一个家庭环境很可能使陈姑娘有较多见识。这位陈么膝下无子，只有二女，要说以女作子，教她们识一些字，也不是没有可能。陈姑娘嫁到朱家，与命运进行了顽强搏斗，企盼着时来运转、改换门庭，尤其对聪慧的小儿子重八寄予很大希望<sup>①</sup>。元璋发迹后，念念不忘他的母亲。显然，母亲对他幼小的心灵，对他的教育与成长，都有很大影响。

元至正三年（1343）濠州大旱，第二年春天，饥荒又加上瘟疫，把钟离变成鬼域之国。从四月初六到四月二十二日，十七天之内，元璋的父亲、哥哥、侄子、母亲接连病逝。四个亲人死丧在地，却没有衣殓，没有棺木，连一角葬地都没有。他的二哥、三哥老实木讷，又外出做了赘婿，四个亲人的灵魂都需要朱元璋这个十六七岁的孩子去安慰。这真是一种惨绝人寰的痛苦。朱元璋草草安葬了父母兄长，只剩下孑然一身。百般无奈，被好心的汪妈妈送到于觉寺出家<sup>②</sup>。50天以后，旱蝗肆虐，

① 据《明太祖实录》卷1：“太后（元璋母亲）尝谓仁祖（元璋父亲）曰：‘八百吾家当生好人。今吾诸子皆落落，不治产业’，指上（元璋）曰：‘岂在此乎？’”

② 元璋出家的寺庙名为于觉皇寺，后名皇觉寺。谈迁《国榷》卷1谓：“九月乙巳，入皇觉寺，一名于觉寺”。于觉寺当为本名。

寺内罢粥散僧，留给朱元璋的便只有托钵流浪一条路可走了。

朱元璋经定远、合肥、六安，沿大别山北麓西行。汝河之畔，淮水之滨，到处留下他的足迹。深山的惊恐，大泽的凄惶，乞食的屈辱，病魔的折磨，一个流浪汉所能遭遇的一切，朱元璋无不亲历备尝。他回忆这段经历时说：“突朝烟而急进，暮投古寺以趋跽。仰穹崖崔嵬而倚碧，听猿啼夜月而凄凉。魂悠悠而觅父母无有，志落魄而倘佯。西风鹤唳，俄浙沥以飞霜。身如蓬逐风而不上，心滚滚乎沸汤”<sup>①</sup>。至今读来，仍不难想象他的悲痛与哀伤。然而，正是这三年的浮生浪死，使他在屈辱中平静，在痛楚中冷漠，在磨难中坚强。使他学会了去适应一切恶劣环境，在万般无奈中为自己寻一条求生救死之路；使他接触了三教九流，体验了百态人生，大大丰富了社会阅历。“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品尝了极至的美妙便无美妙，亲历了最大的忧患更无忧患。三年的浪迹天涯，对朱元璋未来的事业，是一份宝贵的财富。

元至正七年（1347）底，乡讯平安。朱元璋返回钟离，依旧栖身于觉寺。直到至正十二年（1352）于觉寺被焚，朱元璋在这里度过了五个年头。这是苦修的五年，也是文化启蒙的五年。在这之前，朱元璋可能识些字，但不会多。鉴于朱元璋母亲小时候的家庭环境和对朱元璋的期望，她有可能是朱元璋的第一个识读老师。朱元璋甚至可能在孤庄村财主刘继祖的私塾里刁光几天<sup>②</sup>。但以朱五四的家无什物和子女众多，朱元璋不可

① 《明太祖文集》卷14《皇陵碑》。

② 《明太祖实录》卷1有如下记载：“上（元璋）稍长，净貌雄杰，志意廓然，独居沉念，人莫能测。既就学，聪明过人。”



能真正进过蒙学。在于觉寺的情况就不同了。礼拜诵经就是学习，优游闲散的生活也提供了读书（佛经）识字的起码条件。朱元璋在于觉寺应是结合学习佛经补了识字课的。《皇朝本纪》说：“乃西游庐、六、光、固、汝、颍诸州。如此三载，复入皇觉寺，始知立志勤学”可以作为这个推断的一个佐证。至正十二年（1352），濠州遍地兵燹，于觉寺也在劫难逃，化为灰烟。以朱元璋的苦难经历和走投无路，自不难铤而走险。实际上他却是踌躇再三，对僧寺恋恋不舍，说明他已经习惯了这种青灯古佛的生活。这种对破灭佛寺的依然眷恋，除去栖身谋食的原因，恰好表明他对佛国的了解与信仰，对佛经的有知有识。当时儒佛道三教混融已成风气，朱元璋所读，很可能不限于佛书范围。当然，庭除，化缘，为住持僧奔走劳作，像礼经呗佛一样是和尚们的常课，朱元璋不可能有很多时间去搬弄书策，但他确实是开了蒙，识了字。淮西三年，佛居五年，朱元璋读了人生大学，文化小学。正是凭着这丰富的社会阅历和略涉文字，使朱元璋在投奔郭子兴后较一般庄稼汉出身的兵士和头目站得更高些，看的更远些。这是他在郭子兴手下很快脱颖而出的重要原因。

## 二 成为一个多彩多姿的人物

不管是趋势是巧合，是蒙胧是清醒，元璋首先抓住了依附于他的骨干与武装。至正十四年（1354）正月，他统帅 24 人南略定远，作独立发展的尝试。这 24 个人当中，除去花云早死，其他 23 人都成为朱元璋的统兵大将和心腹骨干。下定远，克滁州，取和州，元璋的部队已能与郭子兴力相颉颃。迅猛发展的势头不仅为其他山头所侧目，而且为郭子兴所不容。他被郭子

兴剥夺了带兵的权力，手下干才也一个个被调走，连朱元璋夫妇的一日三餐都难乎为继。这对元璋的毅力与忍耐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他不能申诉，以免火上浇油；也不能翻脸，不能火并，以免落得个忘恩负义，两败俱伤。元璋最好的措置就是忍耐和等待。他或许不知道《易经》中“尺蠖之行，以求申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的圣贤古训，但痛苦的身世特别是三年托钵流浪的磨炼，却给他以默默承受的信念和支撑背负的坚韧。他以周围将士的忠诚和实力为后盾，低眉弯腰，婉事郭子兴一家，使郭子兴抓不到把柄，又不敢贸然下手，在敌人强攻硬取形势严峻的时候，朱元璋又能捐弃前嫌，竭尽全力解难扶危打开局面，最后，郭子兴终于翻然悔悟，改弦更张。不知委曲的人，不得以伸张；不善于蜷伏的人，不得以勃兴；不善于忍辱的人，不得以成大事。忍人所不能忍，方为大丈夫。这在朱元璋身上又一次得到验证。

和州渡江，奠基集庆（今南京），这是元璋事业发展的一个关键性步骤。在元朝，长江一线，划隔南北。长江以北是元王朝政治、军事的重心，大漠南北是它的根据地与战略后方。长江以南则是经济发达，政治萎缩，受到北方的压迫与剥削。南与北的对立，正与社会的对立相映照。韩林儿、刘福通在讨元檄文中提出“贫极江南、富称塞北”，正道出了人们普遍的怨愤。所以，江南正应该是反元革命的根据地和后方。而江南的政治中心正在集庆。占领集庆，意义决非寻常。从当时江北的形势看，韩林儿、刘福通首举义旗，驰骋黄淮，无时不在做席卷北上犁庭扫穴之想，构成元王朝心腹之患，迫使元王朝投入精兵锐卒，张网箝制，恨不食其肉而寝其皮。所以，在这里活动，将要受到韩林儿、刘福通和元王朝两大势力的限制与夹击，没

有什么回旋的余地，没有远大前途。况且，淮北经济残破，衣食艰窘，很难解决大部队的吃饭问题，饥饿的威胁已经成为很多股农民军的大敌。朱元璋毅然渡江，占领集庆，一者得了江北韩林儿、刘福通的庇荫与屏障，二者衣食充足，三者元朝势力单薄，正可以稳扎稳打，进退从容，徐图发展。正所谓一着得手，八面来风。

江南主要有八股势力：长江上游有陈友谅，下游有张士诚，温州、台州、宁波有方国珍，福建有陈友定，广东有何真，还有元王朝和四川的明玉珍。朱元璋就夹在陈友谅与张士诚中间，与明玉珍、张士诚、陈友谅一起构成夹江而居的四大强国。只是明玉珍像方国珍、何真、陈友定一样，满足于割据自保，又悬处于山陬海隅，对元璋威胁不大，他的主要敌手是张士诚与陈友谅。渡江之初，元璋着眼向元王朝要地盘，同时不免与东部接壤的张士诚发生争夺。待至正二十年（1360）元璋夺得徽州、婺州（金华）、处州、严州、衢州大片领土后，元朝的江浙行省基本瓜分完毕，他与陈友谅的缓冲之墙被拆除，则陈、朱、张江南三雄的大战就摆在了面前。

元璋立足楚头吴尾之间，这个地理位置就决定了很难同张士诚、陈友谅的任何一方成立妥协，却很可能被张、陈联合夹击。他面临着两面作战的不利地位。形势逼迫他必须选择首攻方向。在刘基的谋议下，他选择了兵强势众、咄咄逼人的陈友谅。事实证明，这个抉择是英明正确的。他与陈友谅有三次大战。一次在至正二十年（1360）闰五月。陈友谅主动出击，攻占了元璋的老根据地太平，而后鼓棹东下，直捣应天。元璋后发制人，利用有利地形和诈降之计，打速决战，一举破敌。一次在至正二十一年（1361）八月。元璋首先动手，以迅雷不及掩

耳之势，兵临陈友谅都城江州（九江），陈友谅仓惶逃奔武昌。元璋趁势收降南昌，势力达于鄱阳湖畔。一次在至正二十三年（1363）四月。陈友谅乘朱元璋率部解救韩林儿、刘福通安丰之围，亲率60万大军，长舟巨舰，倾国出动，直扑南昌。元璋迅速调兵遣将，亲率20万主力紧急西进，在鄱阳湖与陈友谅展开主力决战。经过七月二十一日到八月二十六日一个多月的激战，陈友谅兵败被杀，主力丧失殆尽。朱元璋的大业已经胜券在握。

至正二十四年（1364）元璋称吴王，建立较完备的政权机构，作最后消灭群雄、推翻元王朝的各项准备。至正二十六年（1366）八月，与张士诚进行主力决战。第二年九月，苏州陷落，张士诚国破身亡。遂即破方国珍，平陈友定，抚何真，浙东、福建、广东、广西次第平定。与南征的同时，派徐达、常遇春主力北伐。在南北奏凯声中，元璋于至正二十八年（1368）正月初四在南京即皇帝位，建国号大明，建元洪武。洪武元年（1368）八月初二，大都陷落，元顺帝仓惶北走，元亡。

洪武元年（1368）九月，徐达、常遇春率部自山西向西北进击。洪武二年（1369）九月，连下陕西、甘肃，又组织大军北征，至洪武三年（1370）沈儿峪大捷和应昌大捷，北元势力受到沉重打击，沿长城一线大体稳定下来。青海、西藏等地先后归附。洪武四年（1371）平定四川明升（明玉珍之子）政权，十五年（1382）平定云南，二十一年（1388）平定辽东，最终完成国家统一。

明朝建国后，元璋积极推行垦荒积谷，发展生产，医治战争创伤，为建立一个理想的小农社会而竭尽全力。他打击豪强，严惩贪污，希望建立一个勤政廉洁的政府。元璋提出“田野辟，

户口增”恢复发展生产的六字方针<sup>①</sup>，制定政策，鼓励垦荒，渴望通过几年的努力，达到唐太宗“斗米三钱，外户不闭”那样的小康水平<sup>②</sup>。进一步，则重现“十年平之，十年富之，十年和之”的三代之治<sup>③</sup>。这样的目标虽然未能完全兑现，但元璋三十一年皇帝做下来，全国确实形成了自耕农的黄金时期。有一首诗写道：“山市晴，山鸟鸣。商旅行，农夫耕。老瓦盆中冽酒盈，呼器骤突不闻声。”<sup>④</sup>透过这些略带夸张的描述，我们不难体验这发自普通百姓的自怡自足的心声。元璋的三十一年是贪官污吏和豪民富室最背时晦气的时代。特别是多年来豪霸乡里的江南富室，更遭到亡宗覆族的致命打击。即使侥倖生存下来的，也多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不敢触法，不敢交结官府，“每戒家人闭门，勿与外事”<sup>⑤</sup>，一副夹着尾巴做人的孱头可怜相，与他们的先辈们赫奕张狂、作威作福的神态恰成鲜明对照。贪官污吏更是重足而立，屏气敛踪。有一段时间，元璋曾对犯赃罪者，不问数额多寡，一概处死<sup>⑥</sup>，使贪墨者黄脸咋舌。也可以看出元璋整顿吏治、净化社会的急切心情。他对元朝以来作恶多端的吏愤恨最深，管束最严。不准参加科举，不准下乡扰民，不准穿鲜艳衣服，只能着皂色，与隶卒贱妓同科。元璋还规定地方官吏的清浊赃廉政绩大小，当地百姓有权评论。触犯法纪的官员可以因为造福一方惠及百姓而免于处分，百姓们还可以将贪

① 《明太祖实录》卷 37。

② 《九朝谈絮》引《蓉塘诗话》

③ 《明太祖实录》卷 239。

④ 《明诗综》卷 100。

⑤ 吴宽《匏翁家藏集》卷 57《先世事略》。

⑥ 《明太祖实录》卷 69 载：“自今官吏犯赃罪者无贷。”

赃枉法官吏直接锁拿进京，敢有刁难阻拦者处以重罪。《大诰三编》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北平布政司乐亭县主簿汪铎等设计害民，被当地百姓赵罕辰等将 8 名害民县吏捆绑赴京。主簿汪铎等赶来哀求百姓说：“我十四岁读书，灯窗之劳至此，你可免我此番，休坏我前程。”<sup>①</sup> 亘古及今唯有官吏锁舒百姓，那有百姓绑缚官吏？只见百姓哀求官吏，那有官吏哀求百姓？此举此风，真有些天翻地覆之概。固然，贪官污吏如野草，芟而复生。直到老死，元璋对官场的状况不甚满意，但后来史家还是对明初的吏治给予高度评价。《明史》编纂者写道：明太祖惩元季吏治纵弛，民生凋敝，重绳贪吏，置之严典。……一时守令畏法，洁己爱民，以当上指。吏治焕然丕变矣<sup>②</sup>。

元王朝是落后的北方游牧族统治，接受汉化的程度又比较低，它所制定的一套礼仪制度带有浓重的蒙古族特色。元璋北伐时打出了“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旗帜，建国之后，也以重建三代礼乐，恢复汉官威仪相标榜。他参阅唐宋成法，重新制定各项礼仪制度。其他如政治制度、军事制度、学校制度、科举制度、赋役制度、工商制度、货币制度、盐茶专卖制度等等，也都损益改革，重新颁布。元璋开规模，立圭臬，所定各项礼仪与制度，不仅为他的子孙所遵循，而且为后来的清王朝所沿袭。

上面我们讲到元璋同贪官污吏进行了不懈的斗争。这些人一部分是由推荐与科举进入官场，一部分是通过军功而来的暴发户。历史的经验和客观的现实，都使元璋觉得，那些信誓旦

① 《大诰三编》县官求免于民第十七。

② 《明史》卷 281《循吏传序》。

且、皇帝圣明的表白没有几句是靠得住的，他在恭敬中看到是揶揄，忠厚中看到是谲诈，惶恐中看到是狰狞。他相信，居功就是叛逆，权势就是罪恶。他们会下欺百姓，上挟朝廷。处理的办法，就是以势压势，以权制权，枝削而后干挺。因而他像走马灯似的调换官吏，提上来，按下去。许多人朝着布衣，替身替换紫蟒，今日立朝堂，明日枷锁扛。如洗衣板上的一件衣服，经过这样的反复揉搓，大约士大夫们就百炼钢化作绕指柔了。对于勋臣武臣，元璋尤其放心不下。这些人坚硬，扎手，无法团揉，唯一的办法就是重锤敲击，粉碎他，消灭他。至于用什么手段，找什么借口，都无关紧要。所以元璋为处理文臣和武将的问题，制造了几次血案。最著名者为胡惟庸案与蓝玉案。这些案子虽然都事出有因，但是借端杀戮，兴起大狱，则都是元璋除梗灭顽、强干弱枝既定方针的实施。从各种迹象可以看出，元璋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往往经受着巨大的精神煎熬，但作为一个政权的化身，他也只能在同自我的对立中把事情干到底。元璋把他自己当作树干，把皇太子、皇太孙当作树干，把亲王诸子也当作树干。当剷除了大部分勋臣武将之后，这朱氏家族之干固然是显出了粗壮挺拔，然而，到晚年，元璋忽然发现朱家兄弟子侄内部业已分裂，对照孱弱的皇太孙朱允炆这条主干，那些藩国诸王也是权枝，而且一个个戟然森然，不可枸曲。元璋不可能将他们统统砍削，就是采取一些稍微得力一点的措施也已经来不及了。

朱元璋由放牛娃变成皇帝，由地无一垄变成富有四海，由任人宰割变成可以宰割任何人，简直是一个神话，一个奇迹。人们甚至只能通过天命来解释这一切。他在与元王朝和群雄的拼杀中，往往能出奇制胜，逢凶化吉，他的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

军事才能，常常令人叹为观止。他的三十一年皇帝生涯虽然被后人褒贬异词，但是他振兴破败的雄心，反腐倡廉的执着，治势理乱的辛勤，以及开规模、立条章、审形势、构框架中所表现出来的局器宏阔、处事条理，都令人仰若山斗。当然，人们也可以从朱元璋身上看到一个发了迹的农民、一个当了老爷与当了老官的奴才的狰狞，看到专制皇帝的残忍。总之，他是一个五光十彩的人物，一个耸山涵海突兀迭宕的人物。你从任何一侧面去观察，都能发现他的不同凡响之处，你从任何一个视角去探索，都能感觉到他所特有的启迪与震撼。也正因为如此，在这里很难就朱元璋的一生作全面评述。这套《洪武全书》更多地涉及朱元璋的著述与文化建设，因此就需要集中发掘与阐述一下朱元璋这位自幼失学的开国皇帝的文化素养诸问题。

### 三 朱元璋与文化人

文化如积沙，越积越厚。它沉淀了过往的经验与智慧。书册是文化的主要载体。文化不是人们与生俱来，书册也不是为一日三餐劳碌奔走的普通农民所能轻易掌握，必须通过长期艰苦学习而后得，因而一般是有闲者的专利品。文化人，或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就是那些有闲者中间的一个特殊集团。这个集团也正是封建王朝立法行政的主要依靠力量。元朝政府推行民族压迫政策，维护固有习俗，固有治法，歧视汉人，歧视汉文化和汉族知识分子，使这些文人学士中的大多数仕进无门，岐路徘徊，不得不隐身巷陌，和光同尘。这就使他们比较容易地卷进农民造反的大潮。大量落拓书生背叛朝廷，作贼作寇，是元末农民起义的一大特点。这不仅为农民起义增强了活力和智



慧，而且给朱元璋这样的胸怀大志虚心向学的人提供了学习传统文化的良好环境和方便条件。

最早跟了元璋的文化人，当推定远毛骐。元至正十三年（1353）元璋自濠州趋定远，毛骐“扶县令出降”，帮助元璋攻下第一个县城，并为元璋“筹划兵事”。<sup>①</sup>而后是定远冯国用、冯国胜兄弟及李善长入伙。这是元璋最早的心腹和谋主。克滁州，儒士范常“杖策谒军门”<sup>②</sup>。胡惟庸、郭景祥、李梦庚、杨元杲、阮弘道、侯元善、樊景昭、汪河等也先后来投<sup>③</sup>。渡江前，元璋幕府中管文案、参谋议的著名文化人已有十多个。

至正十五年（1355）六月，渡江克太平，耆儒陶安、李习等迎降。陶安是入幕的第一个举人。同时被征聘的还有宋思颜、潘庭坚、王恺以及流寓太平的名士汪广洋。十六年（1356）三月攻克应天，儒士夏煜、杨宪、孙炎、孔克仁、栾凤、陈养吾、王瑋等十几人被征入幕府<sup>④</sup>。这时，元璋羽毛渐丰，更注重收罗大批知识分子，以提高决策能力，扩大社会影响。占领应天不久，命徐达攻打镇江，特意嘱托他寻访避居镇江的元江南行台侍御史秦从龙，并用隆重的礼仪把他接到应天<sup>⑤</sup>。秦从龙又把“笃学博览、精象数之学”的陈遇举荐给元璋<sup>⑥</sup>。

多年的经验使元璋发现，一个地区的书生名士，往往就是该地区的宗法家族领袖和精神支柱，他们有着相当强的影响支

① 《明史》卷 135《毛骐传》。

② 《明史》卷 135《范常传》。

③ 参见《明史》各本人传。

④ 《明太祖实录》卷 4；《明史·宋思颜传》。

⑤ 《明太祖实录》卷 18。

⑥ 《明史》卷 135《陈遇传》。